

# 党委中心组学习资料汇编

2016 年第 1 期（总第 55 期）

江苏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印

2016 年 3 月

## 目 录

### ◆ 高层声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 五大政策推进供给侧改革..... 1

### ◆ 权威解读

人民日报评论员五论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5

人民财评系列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9

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6

### ◆ 学习参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有哪些重磅信号值得关注? ..... 26

从关键表述看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8

一图看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 30

### ◆ 媒体聚焦

2016 年这十大政策将影响你我生活..... 3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歼灭战”集结号..... 3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稳增长调结构..... 3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四大领域“歼灭战” ..... 3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宽财政稳货币..... 38

### ◆ 原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摘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0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44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4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4

## ◆ 高层声音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 五大政策推进供给侧改革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 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经济形势 新常态下基本面向好但也面临困难挑战
- 五大政策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 深化改革 出台一批牵引作用重大措施
- 五大任务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 扩大开放 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
- 保障民生 注重精准帮扶与政策托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2015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 2016 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 2016 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2015 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2015 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使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

###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五大政策支柱**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

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 **2016年经济工作抓住五个关键点**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了变化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

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 **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改革举措**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科学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住基本民生、兜住底线。要健全督查激励问责机制，促进各方面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号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2016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 ◆权威解读

# 人民日报评论员五论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扎实稳妥 “十二五”胜利收官

——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个圆满的句号，往往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开始。

“2015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回望2015年以来和“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大势，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进行深刻阐释，是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的重要遵循。

稳，是201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稳，首先体现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在中高速、稳在合理区间，预计全年增长7%左右，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年经济总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稳，更体现在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结构稳步优化、质量稳步提高，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60%、服务业比重超过50%，增长新动力新亮点不断出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稳，还体现在改革的稳步推进，民生的持续改善，风险的妥善化解，社会大局的总体稳定。2015年主要目标任务完成得稳、完成得好，使“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划上圆满句号，也为“十三五”时期发展顺利开局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说“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首先就在于取得的成就“实”，可谓实实在在。数据最有说服力，总的看，规划所确定的24项主要指标都将完成。从几项主要指标看，这5年，经济年均增长7.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从4516美元增加到约8000美元，城镇新增就业6400万人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8%，农村贫困人口由1.66亿人减少到6000万人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49.95%上升到55.8%，高速铁路里程从0.5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以上、占全球60%多，节能减排指标全部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新台阶，站在了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实，还体现在百姓的感受上，可谓真真切切。“十二五”时期，可以说是群众得到实惠多、感觉变化大的时期。居民收入增长跑赢GDP，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的腰包鼓了”。就业机会增多，人们感叹“不挑不拣都会有事做”。保障房超额建成，医保实现全覆盖，群众从中获得实在益处。脱贫攻坚力度加大，贫困群体感受到真扶贫、扶真贫的力量。改革给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去政府部门办事更简捷方便，创业创新的机会增加、阻力减少。群众普遍感受到党风政风之变，称赞“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十二五”发展成就的真切实在，振奋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来之不易的成绩，源自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的顽强拼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尽管前进路上依然存在风险和挑战，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扎实稳步推进，就定能不断闯关夺隘，创造未来。

## 审时度势 “十三五” 崭新局面

——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起跑决定后势，开局关系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大势作出了科学性、前瞻性的分析和判断，为实现“十三五”崭新局面作出了战略部署。要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在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因无以知事论断”。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正确认识经济大势、准确研判经济态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总体来看，尽管艰和险在增多，但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

从国内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新旧动能也在转换之中，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较大、风险隐患增多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但形有波动，势仍向好。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在发生可喜变化，前景是光明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完成了2015年主要目标任务，使“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划上圆满句号，为“十三五”崭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国际看，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比较大，出现突然性事件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投资、科技创新和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这些重大关系，正在着力应对。可以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既充满机遇又富有挑战。只要我们深入研判，及时做好预警、预案、预控，保持战略主动，抓住有利机遇，主动有所作为，继续做强自己，把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搞上去，就能为实现既定目标营造有利外部条件。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审时度势，关键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实现“十三五”崭新局面，根本的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引领发展、推动变革，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开局是胜利的关键。只要我们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锐意推进改革，就能为实现“十三五”崭新局面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 遵循逻辑 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临大势贵在顺而有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就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遵循大逻辑，顺应大趋势，不断增强和发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面对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住时机进行战略性调整就能顺利过关。面对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能有效化解。只有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心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的“十个更加注重”，可以说是引领新常态的方法论、实践论。比如，过去主要看增速有多快，现在就要看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过去有的城镇化“见物不见人”，现在就要注重以人为核心、回到让更多人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这样的转变中，蕴含的是思维和方法的转换。再比如，供给侧矛盾突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这样的转变，是工作要求和侧重点的变化。总之，顺应新常态这个大势，做到“十个更加注重”，就能有力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不会遵循大逻辑，能不能有新作为，是对各级干部的重大考验。进入新常态，不少同志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干为好，正所谓“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确，对新常态有一个深化认识和逐步适应的过程，但适应一定要雷厉风行、殚思极虑，适应得越快越好，不能坐着等、站着看。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深入回答了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的问题。结合本地实际深刻领会、认真贯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就能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使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 改革创新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改革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法宝，也是开创美好未来的关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做好改革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个重点任务，就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破除发展障碍、增续内生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经济持续发展也面临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导致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面对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当此之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就容易让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改革是解决矛盾、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37年来，从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正是为了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进而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国经济必将培育新动能、焕发新活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 锐意进取 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化改革，针对真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经济发展，找到实办法才能行稳致远。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站在中国经济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之作为完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观察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找准病根更重要。目前，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已在供给侧。现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在递减，而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同时不少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出国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药品、牙膏。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痛苦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是五块硬骨头，我们要懂得化解产能过剩，才能为优化供给结构腾挪空间；降低企业成本，才能让企业轻装上阵、激发活力；化解房地产库存，才能稳定房地产市场、形成良好预期；扩大有效供给，才能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防范金融风险，才能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做到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才能消化无效产能、培育新动能，让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五大政策支柱”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让政府调控更加有效，让市场运行更加顺畅，就能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从而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只要我们把握正确方向、奋力开拓进取，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就一定能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 人民财评系列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不一样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12月21日，为期四天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落下帷幕。因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定调2016年的经济工作，还要对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工作进行总体筹划，这使得本次会议意义更加深远，定调、筹划工作更加谨慎。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工作会议，不负众望，释放了更多的重要信号：

首先，会议明确201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和总思路。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将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大政策支柱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其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稳增长，着力强调从供给侧入手，解放生产力，增加新供给，改善供给结构，提升竞争力。因此，本次会议更多鼓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地位，在激活市场动力的同时，也不降低政府监管的力度，使供给侧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成为稳增长的方法和路径，更好地为促进稳增长服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当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2016年四大改革看点有：供给侧改革、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再次，会议指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对内，积极化解产能过剩、降低房地产市场库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2016年积极工作重点。

对外，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重点。同时，将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扩大有效供给方面，会议提出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精准扶贫，减少贫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培优新兴行业，培优人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双创”。而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我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依托。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对象国来说，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加快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其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合作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此次会议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会议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求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将有效激活商业银行的活力，有利于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保险、基金、融资租赁等多元化经营。商业银行要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的发展转型，创新新产品和服务，继续实施综合化经营，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中间业务，以降低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会议将精准扶贫、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发展新产业、加强农业现代化等推上 2016 年经济工作重点，这也将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商业银行将承担更加综合化的融资服务角色，一方面积极创新新产品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还可参与项目的设计、开发等咨询顾问服务。通过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业银行将提升高智能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三，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对金融服务在提出要求也创造新的发展空间。首先，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对重点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服务；其次，在加强风险防范前提下，银行可以发挥援外优惠贷款的作用，扩大支持国别范围和行业领域；再次，为支持国际产能合作，中资金融机构应加快海外机构建设，支持企业以境外资产、股权等权益为抵押开展贷款，探索境外发债备案制，鼓励开展公私合营项目贷款业务。借助上述机会，商业银行将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

第四，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这将为商业银行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银行进一步化解不良贷款、稳定资产质量。会议还强调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各类融资行为得到规范，也将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腾挪出更多的空间。

昨天是冬至之日，而我们正在谋划春天的故事。（作者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8 大着力点

黄剑辉

2015 年全球经济在曲折艰难中前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普遍回落。展望 2016 年，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将继续呈现深度结构调整特征，中国经济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态势

逐步企稳。期间，宏观调控预计将着力从供给、需求两端强化，形成“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发力的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经济增长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GDP增速呈连续下行趋势，到2016年，这种下行压力必然存在一定的惯性。

但一些积极因素正在形成的新动力也不容忽视。供给侧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的新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发展，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双创”将重点服务于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其中，服务业领域通过创新植入互联网基因已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不断涌现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甚至不少创新企业如专车等已开始倒逼制度改革。

需求侧方面，消费升级和聪明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要想更好的释放消费升级需求所蕴含的增长潜力，就要鼓励针对这些新需求的有效供给，鼓励“聪明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化主体合作制约下的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融为一体。

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构建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也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蓝图，明确了新的目标要求、发展理念和重大举措，也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和激发社会活力。

要想进一步巩固发展上述这些积极因素与新动能，就亟需改变过去更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宏观管理思路，有必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潜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上升为国家最高决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的新征程。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表述，标志着中国宏观管理思路的重大变化，将会构筑起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也再次强调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当前，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政策重点，将转向落实五中全会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启动“十三五”规划，并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而该框架的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从具体措施看，一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改革加大“新制度供给”。放开价格管制，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优化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市场调节功能。

二是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及其素质。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劳动力质量与结构的提升，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三是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探索“股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优化农业发展模式，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四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供给。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不同规模、多元化的经营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六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大对工业基础设施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示范项目及其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七是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双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处置权限，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八是加强节能环保，打造“美丽中国”。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投入力度，建立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促使环境友好技术及产品的推广，支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促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综上，从中长期研判，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深化和落实改革开放”、“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及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态民生持续改善的“新增长”、“新发展”之关键。在中国经济暂别“7”时代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必将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新未来。（作者系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国企改革相衔接

许维鸿

历时四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圆满闭幕，“结构性改革”成为最热词汇，结合过去一个月最高层反复提及的“供给侧”改革，可以说新一轮改革指导精神的“理论话语”已经确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进一步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随着中国从“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当前经济面临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进入消费型社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这也是欧美羡慕中国的地方，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完全可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支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是，我们当前很多政策和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投资型社会阶段，而不是迎接喷涌而出的巨大消费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指出产业结构要“加减乘除”并举，而非单纯地“关停并转”，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用产业升级留住中国消费者，必须通过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配置，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的效率，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力推的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以 PPP 模式为核心的投融资体系升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就是强化市场的力量，弱化各级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需要看到，如果没有对行政领域和一些行业“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限制，新一轮的“去产能、调结构”，又会像前几轮一样无功而返。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攻关领域。国有企业涉足战略性国民经济部门，与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并不矛盾。2015年9月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从传统上的“管人、管事、管钱”，升级为“管资本”，促进国有企业供给系统的生产效率。

实践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并非源于“国有”的所有权结构，而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政企不分。国企的监管者和经营者应该被严格区分，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在笔者看来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特别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本来就应该是企业家，各级员工不应该有行政序列编制和类似公务员的“铁饭碗”。国有企业需要有层层设定的绩效考核，并与弹性的收入挂钩；国企带头人除了自己要接受严格的绩效考核，还必须被充分授权，能够根据市场竞争需要选人用人；国资委等监管部门则通过任命董事长和监事长，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股东权利，不直接干涉企业运营，依法市场化公开聘用、考核企业管理团队。

这种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必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无条件、盲目”服从各级政府指令，回归到企业经营本质，重视投资效益、重视技术创新、重视人才培养、远离产能过剩行业，最终通过微观的企业盈利状况改善，汇聚为宏观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环顾当今世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其实都面临“次贷危机”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但是由于选举周期影响，决策者往往只能通过“周期短、见效快”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赤字投资等“救市、维稳”。可以预言，在新一轮创新驱动的物联网大潮中，哪一国的宏观政策及早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放眼长远地转向长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长潜力，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工业4.0”下的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赛中胜出。（作者系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 中国实现经济增长还有很多“好牌”可打

高连奎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笔者认为，只要政策配合到位就大有可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好牌”还有很多。

近段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了热词。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有效供给促进消费的案例已经有很多，譬如美国的苹果手机，再譬如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高铁以其安全、舒适、快捷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出行工具之一，也成为了中国的一张新名片。虽然中国修建高铁是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不足理论出发的，但高铁却是实实在在的新供给，这种新供给也带动了需求。

市场普遍对“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新供给”感到压力甚至有一些恐惧，担忧存量调整会带来冲击，实际不必过度担忧。“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新供给”与我们以前所说的产业升级大体一致。

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开展的如火如荼，近几年中国在各个产业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冲刺世界先进技术的企业。比如电信、手机领域，华为正在崛起，其在电信设备方面已经做到了世界顶级，在手机技术方面也在不断进步。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也有不少企业异军突起，在近日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一次世界级赛事上，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豪华旅游大巴创造了一次充电续航里程

1018 公里的佳绩，分别创造和打破了“商用电动巴士最远续航里程”与“商用电动汽车最远续航里程”两项世界吉尼斯纪录。此外，中国的“互联网+”也大有可为，滴滴等互联网租车企业大大降低了民众的出行成本，缓解了公共交通压力。

对于去落后产能也未必是一刀切。除了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亟待处理外，国内家电产业、电子企业自动转移到了中西部，看得更广阔些，中国的纺织行业转移到了越南，制鞋企业转移到了非洲，这些产业转移市场会自动完成，没必要强制出清。

笔者认为，中国新兴产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处处都有潜力与希望，政府能否为这些企业提供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是中国企业能否顺利升级转型的关键。世界很少有国家是因为产业问题导致经济衰落，反而更多是因为实行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危机或是长时间萧条，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处理不得当。本次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十分恰当的。

近年来，“融资难、融资贵”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本次会议提出降低融资成本，非常必要，因为中国企业暂时的困难更多是高融资成本造成的。

本次会议还提出，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笔者认为，扩大有效供给，不仅是要扩大企业供给，也应扩大政府供给，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供给应该先行。政府供给不足会对企业供给产生压制，比如汽车需求就是一个被严重压制的行业。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提高居民社保水平。总之，不仅是企业，政府也要提高供给能力，而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因此，中国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手里的“牌”还很多，且潜力巨大。（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 中国经济正发生期待之中的结构性变化

黄志凌

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并且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多项政策举措。这是在准确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安排。

始于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迄今已经持续了八年。其间，中国经济经过短暂剧烈波动（2008-2011）之后进入了较为漫长的横向盘整期。笔者认为，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 GDP 增速变化态势，还要看这种增长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增长结构是怎样的，是否可持续，以及增长代价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分析中国经济，人们多会关注 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物价指数、外贸（进口、出口）、金融（M2、新增贷款、社会融资规模）等主要经济金融指标。依据传统经验与观察标准，这些指标的时点数据与过往轨迹未必好看。

进一步观察，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更是异常复杂，认识分歧在所难免。笔者感觉到，当下的中国经济很难用“好”与“坏”来简单概括。“好”“坏”之争，往往出于总量分析，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结构性变化来观察，所谓的“好”与“坏”都是存在的。深入到经济结构层面、从不同角度揭示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化背景以及这种变化是否为我们所期待，可能会更客观地描述中国经济现状。

首先，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动力，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高达 60%。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出口拉动让位于投资拉动，2015 年则出现了投资拉动让位于消费驱动的明显迹象，消费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餐饮收入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良好增长势头，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升温明显；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速一直保持在 40%左右，占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到 9.8%。

其次，财政支出持续发力，预示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功效明显不同。经济上行期，货币政策效果要明显大于财政政策；而在经济下行期，财政政策的效果要明显大于货币政策。针对 2014 年以来出现的货币政策“钝化”现象，2015 年伊始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主要是加快部分重点支出预算执行进度。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置换地方政府债券力度加大和在建项目政策措施落地，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再次，高能耗及产能过剩行业微观指标低位运行，直观上看是经济下滑的表现，而实际结果却是我们近年来宏观政策目标梦寐以求的。六大高能耗行业增速及企业利润增速放缓，虽然拖累了整体工业增速，但也反应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钢材、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增速持续下滑，部分增速由正转负，产能过剩行业持续处在去库存的过程中。纺织、鞋帽类产品出口下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增速放缓，显示了我国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说明经济转型还将持续。

其四，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表明经济结构升级步伐已经启动。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速度加快。2015 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大幅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速。上半年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增长 19%，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 13.5%。高技术企业利润高增长，反应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从出口产品来看，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保持稳健。

观察历史轨迹，2012 年以来，尽管经济规模持续增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 GDP 增速，并没有因为经济下行而改变平稳增长态势。

其五，单位 GDP 能耗降低，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2011 年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降，尤其是 2015 年年初以来同比下降 5.9%，降幅进一步扩大，为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新进展。

当然，从结构上观察部分经济指标也在“变坏”，例如对外贸易疲弱格局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对于这种“变坏”也应辩证看待。近期进出口数据大幅回落，虽然有需求面疲弱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落也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看到，海外经济体需求分化明显，对美国、东盟出口保持增长，而对欧盟、日本出口下降。即使是出口增速出现的结构分化，也不应过分悲观；主要商品进口量稳中有升，考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进口额的抵消，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拉动作用更大。

大家一直关注的工业生产仍然低位运行，且增速有所回落，尤其是发电量增速由正转负，也在数据上印证了工业生产增速下滑的严峻现实。但从经济结构来看，在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主导、高能耗行业处于持续收缩的状态下，仅仅靠用电量增速变化还不足以判断经济形势。即使从铁路货运量来看，虽然普通铁路运输和货物周转量出现负增长，但我们也要注意其他运输方式对普通铁路运输的替代效应明显，尤其是在公路运输保持平稳状态下，民航客货、高铁客运量持续快速增长。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此消彼长，意味着新旧增长动力逐步转换，成为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滑，以装备制造、计算机通信行业、再生资源利用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平稳甚至加速增长，显示结构性改革和定向调控效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各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此消彼长。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年来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商业模式迅速兴起的革命意义。应该说全社会对已经发生的商业革命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商业模式革命不仅对潜在消费需求唤醒实现、提升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极具意义。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很重要体现在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商业模式革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互联网商业发展空间巨大。继续推动商业革命，推进商业模式演进，对激发我国潜在需求，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带来的作用将是革命性的。（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 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将有效激活商业银行的活力

2015年12月21日，为期四天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恒丰银行研究院常务院长胡海峰在接受人民金融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主要总结了2015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阐述了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部署了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经济转型关键年，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意义更显深远。

他认为，会议首先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和总思路。2016年经济工作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四大政策支柱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其次，会议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稳增长，着力强调从供给侧入手，解放生产力，增加新供给，改善供给结构，提升竞争力。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再次，会议指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对内，积极化解产能过剩、降低房地产市场库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2016年积极工作重点。对外，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重点。同时，将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此外，本次会议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胡海峰认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将有效激活商业银行的活力，商业银行应加快转型发展，创新产品和服务，做很方便的银行，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 中国经济调“车道” 带给世界新机遇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世界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将向何处去，能否行稳致远，举世关注。

如何定位2016年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重大部署，确保“十三五”的良好开局，也拉开了结构性改革攻坚的大幕。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助推中国经济新旧车道转换的重要年份。“十三五”期间，中国仍将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同时还要实现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列车需要从高增长、低质量的旧车道转向中高增长、高质量的新车道。

关于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如在去库存方面，中国将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这将有助于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会议还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会议提出10个“更加注重”。其中有关调整产业结构，会议指出，“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加减乘除，非常形象。

“十三五”前期，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局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减法和除法，需要按照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产业结构仍然有巨大的加法与乘法空间。

此外，外需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016年，中国将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为中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的同时，也将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中国还将改善利用外资环境，并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绿色发展改善生态质量。中国经济发展将进一步绿色化，将更加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区域发展，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风物长宜放眼量”。经过几年结构性调整，“十三五”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驶入新车道。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的作用，同时将为全球的贸易与投资提供新的动能，为世界作出更多绿色贡献。一个中高速增长，但更加公平、更加绿色，充满活力的世界创新工场，会比一个超高速增长的世界制造工厂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鄢一龙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学者）

## 首提“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信号明显

2015年12月21日，伴随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落幕，我国2016年的经济工作方向基本落定。在此会议公报中首次提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专家认为，2016年，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可能步伐更快，从而为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提升企业的成本竞争力做出贡献。

前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没有提到“汇率”。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其中，在“宏观政策要稳”政策支柱中，首次提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这一表述虽不起眼，但信号意义明显。

###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弱化美元影响**

谈到有何信号意义，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2016年，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可能步伐更快。从而为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提升企业的成本竞争力做出贡献。”

事实上，2015年对于人民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15年，央行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实现了人民币一次性小幅贬值。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后，决策层更持续释出人民币汇率要更加市场化的信号，央行更于本月明确表示人民币要盯住“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

“央行的主要目的是管理预期，希望市场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希望分散或者减轻改革过程中投机者带来的压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肖立晟说。

2015年以来，由于美元升值过快，人民币对美元外的主要货币仍在升值，出口面临更大压力。随着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利率政策走向背离，美元2016年可能更加强势。

专家认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正是要避免人民币跟随美元过度升值，让人民币对美元出现适度小幅贬值。“央行在等待时机放开汇率限制。在没有等到这样的时机之前，应该还是渐进式的改革。”肖立晟说。

###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恢复工业牵引力**

在鲁政委看来，工业企业的景气程度与本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降方向相反。

对于我国来说，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反向变化。鲁政委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宏观政策要稳”之下，首次明确要求“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这意味着，加入SDR之后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我国第二产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可望重获竞争力”，他说。

鲁政委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是造成当前企业的困难主要原因。

鲁政委提出，有效汇率刻画的是一个经济体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产业可贸易程度最高，因而，汇率高估直接令第二产业的企业特别困难。

实际汇率高估是怎么形成的？鲁政委认为，关键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缺乏弹性。人民币汇率跟着美元走，但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如果继续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将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

## **稳中求变基调不变**

张棉棉 柴华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天闭幕，专家解读，稳中求进的基调不变，为十三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坚持宏观政策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认为，只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实现组合效果，中国经济就能实现新常态、新发展。

韩保江指出，首先，宏观政策要稳，既要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要保持稳健货币政策。但这个稳健货币政策一定要向宽松、向灵活方面转变，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其次，加强产业政策针对性，切实把限制发展的行业降下来。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如何通过对企业有效的政策，让企业能够在这种灵活政策中，分享到政策红利。第四，社会政策要托底，因为在这一轮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下岗失业人数增长，需要在社会政策上，下决心把底线守住的。

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说，相比过去，这一次把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提到一个新高度，是由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其实需求侧已经非常地市场化，而供给侧没有能够及时顺应需求侧的变化而调整。

巴曙松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特点就是产业分化，有的能够顺应需求变化的产业，比如消费、物流、医疗、健康等增长都不错。那些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应及时做出调整。

## 积极稳妥去产能

开栏的话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对2016年经济工作全面部署的重要会议，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重点部署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本报从今日起，就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系列解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9%。1—11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45个月负增长，这背后，是产能过剩形势已非常严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曾表示，目前有很多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

### 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产能过剩，最直接的危害是拖累企业利润率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降幅比1—9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产能过剩行业利润下降明显。例如，10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69.6亿元，同比减少63.4亿元。

“产能过剩使得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整个行业利润难以保证，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说。

产能过剩企业还占据了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资源。”刘元春说，“一些过剩行业中，效率低、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形成了‘吸金黑洞’，导致行业内一些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在部分过剩行业，一些企业为了摊薄单位产品成本、维持生产经营，甚至继续扩大生产，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局面。产能严重过剩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16 年经济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去产能。

### 面临人员安置、债务关系处置等多方面难题

然而，去产能绝非易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后，往往会遇到产能过剩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

“化解产能过剩是一场难打的硬仗。”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崔民选说，一方面，产能过剩企业多有大量负债，有些企业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企业既有对银行的负债，也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应付账款，以及企业之间的担保，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三角债”给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都带来很大难度，处理不好还会造成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众多。“淘汰落后产能、消灭僵尸企业，都涉及大量职工转岗安置的问题，处理不好容易造成企业内部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崔民选说，“而且，从短期看，去产能可能还会给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带来下行压力。”

另外，化解产能过剩还是一项技术活儿，宏观调控之手如果干预不当，也会“错杀”好企业。比如，有些行业属于结构性过剩，即“低端过剩、高端不足”，这类过剩行业中也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的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 为经济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就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去产能也可以是‘立’，即通过并购重组重塑企业活力。”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当然，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还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刘元春说。这方面，“十二五”期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不仅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既定的目标，同时还完成了追加目标。

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以及没有市场前景的“僵尸企业”也很重要。刘元春说，这方面要注意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做好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工作。

冯飞说，“僵尸企业”处置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资产处置，二是人员安置。资产处置要更多地采用市场的办法，比如支持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呆坏账加快处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

市场化原则参与处理破产重组和退出企业的债权债务。人员的安置，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要建立社会的保底政策，主要是要完善下岗分流人员的安置政策，使得失业人员能够顺利地转岗，包括培训其技能。

在大力增压缩存量的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增量。“严格控制增量既包括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继续扩张产能，也包括要防止新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刘元春说。

化解过剩产能虽然不易，但只要有耐心、有决心，一定可以加快去产能的进程。刘元春说：“只要上述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我国去产能的进程一定可以加速。去产能的推进和市场空间的释放，将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 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2016年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楼市库存究竟有多大，究竟该如何化解？

### 楼市库存压力有多大

#### 期房需要4.5年来消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37万平方米，比10月末增加1004万平方米。即便库存仍在增加，2015年前11月，我国还新开工房屋140569万平方米。这意味着新房仍将源源不断涌向市场。

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算了一笔账，截至2015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约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2015年中国楼市呈现的特点与过去十年间供不应求的局面完全不同。”

受库存压力的影响，201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同比增幅持续放缓和快速下滑。“2015年房地产住宅投资同比增幅持续下滑，已快接近2009年2月的历史最低值。”倪鹏飞说，房地产投资下降直接拖累经济增长，初步测算，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降到只有0.04个百分点，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几乎要落入负增长贡献轨道。

实际上，2015年以来，中央出台的有利于稳定楼市的调控政策不少。2015年“330新政”后，在降低房贷首付比例、购房满2年免征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已经从1至2月的-16.3%，逐步回暖，最终使去年底至2015年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呈现出对勾型反转。

然而，受不动产特点的局限，楼市回暖程度并不一致，压力分化是2015年楼市最突出的特点。分区域看，1—11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6%，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8%，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分城市看，库存压力更非“全国一盘棋”。在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李超看来，过去几年住房需求的“同跌同涨”的局面，在2015年终结，楼市进入了一个全面大分化时期：一线城市和人口基本面较好的二线城市，住房需求持续高涨，总体上呈现“量稳价增”的局面；其它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从规模扩张转为结构优化，总体步入“量减价稳”阶段，有一定的库存压力；部分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需求总体乏力，“有量无价”，库存压力大。

### 去库存如何发力

## 远近结合，供求双向发力

“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依然很大，可见单纯依靠宏观政策，已经难以刺激需求，更难达到综合目标。”倪鹏飞说。

正是基于目前的楼市特点与人口特征，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楼市去库存开出的药方更加突出改革红利，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楼市去库存要近期与远期统筹结合，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多措并举。制度性变革有利于解决房地产中长期需求问题，而短期看，去库存还是要在库存压力大的城市减少甚至限制新的供应，并鼓励开发商降价出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

倪鹏飞也认为，去库存需要双向发力。供给端要做减法，减少库存高的城市和区位的新房开工规模；通过企业并购重组等形式减少项目烂尾。需求端则要做加法。“打通保障房与商品房的供给渠道，如果棚改可以从商品住房市场购买项目，则5年可以消化库存15亿平方米。此外，还可以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形成针对农民工等中低收入人群、按照商品住房产权分期累计让渡的购房支付机制。”

目前库存压力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而这些城市去库存不能仅依赖住房政策，还需要产业支持。“不解决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问题，房地产政策效果有限。”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产业是支撑城市人口集聚的关键因素，提高三四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才是解决楼市库存的重要出路。

## 去库存面临哪些挑战

### 切忌“一刀切”，过剩城市需严把土地闸门

有人质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是不是意味着北京、上海、广州也可以全面放开限购了。对此，张大伟分析，全国唯一还在执行的限制性政策只有贷款套数的限制和一线城市的限购。考虑一线楼市现状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取消仅剩的这两条限制性措施的空间并不大。

也有人提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去库存是此次“药方”的一大亮点。不过，不少专家认为，这对化解三四线城市库存的作用有限。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利于完善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不过引入机构投资者还需要看配套扶持政策是否落地。”任兴洲认为，目前一二线城市的租赁需求比较旺盛，但是库存压力不大，因此房价较高，导致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的资金压力很大，如果没有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很难盈利。反观三四线城市，虽然库存较高，但租赁需求不旺，现有市场基本没有太大缺口，机构投资者未必有投资意愿。

既然楼市分化加剧，去库存也切忌“一刀切”。“每个城市得的病不一样，也不能吃一样的药，一定要因城施策。”任兴洲分析，2015年“330新政”后，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的住房需求释放较快，目前库存正常。而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在持续增加。“这种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忍住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短痛，尊重市场的调整周期，严把土地供应的闸门，决不能再给市场释放压力。”

## 憧憬中国经济三大新动力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为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除了不少一以贯之的提法，本次会议还出现了不少新提法，从而让我们可以从中憧憬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第一，城镇化提速提供新动力。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民工市场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为此，“（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这意味着，在经过过去十多年钢筋水泥的城镇化之后，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阶段。对于房地产业来说，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也开始成为这一阶段房地产业的主要发展机遇。更多农民工的市场化，有利于消费和供给的对接和释放。

第二，破刚兑，整顿金融秩序，重振金融发动机。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都墨守着“刚兑”传统，由此导致不同主体之间的融资成本无法按照信用风险进行定价。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这意味着未来将会打破刚性兑付，这是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之后，深化利率市场化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助企业优胜劣汰。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刚兑传统，也诱发了各类混淆视听的非法集资的大行其道，它们以高息吸金的庞氏融资方式与正规金融机构争夺资金，导致正规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居高不下，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造成困难。

第三，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恢复工业牵引力。笔者对主要经济体工业企业盈利状况的分析显示：工业企业的景气程度与本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降方向相反。对于我国来说，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反向变化。会议在“宏观政策要稳”之下，首次明确要求“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这意味着，加入SDR之后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我国第二产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可望重获竞争力。（作者鲁政委 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 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境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1日落幕。华文媒体关注称，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的新亮点，显示中央充分了解当前经济，对经济新常态认识清醒，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有充分决心和信心，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境界，助推经济转型的活动将风生水起。

法国《欧洲时报》22日评论指，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次会议是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更是在对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重点部署。

文章说，中国经济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实现新常态、新发展的决心很强，这对经济决策及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诸多应对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一大亮点，也显示出最高决策层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新思路。

分析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年末的陡然升温，给人一种新鲜感，但实际上，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背景。

伴随官方对“有效供给”的重视，通过供给侧改革恢复市场活力、助推经济转型的活动也将风生水起，中国经济发展由此走上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发力的新阶段。

新加坡《联合早报》22日报道援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分析，供给侧改革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减少不合理、没有市场、没有发展动力的产业的过剩供应，另一方面是扶持有市场需求、合理的产业的供应，如养老业。两方面必须同步进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余淼杰受访时指，本次会议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供给侧改革，但推动供给侧改革并不等于不考虑到需求。

香港《经济日报》21日社评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力“稳经济”憧憬，聚焦于供给侧改革，此实是思路改变，以解供应过剩产生的众多后遗症。

香港《大公报》22日文章分析，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撬动影响。

#### 着力结构性改革 开创经济新境界

《香港商报》22日文章表示，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政策的新亮点，显示中央充分了解当前内地经济，对经济新常态认识清醒，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有充分决心和信心，并不打算走传统经济刺激的老路，而是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寻求创新动力来稳增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探索出稳妥途径，描绘新的图谱，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境界。

分析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产“去库存化”方面，明显加大了力度，提出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鼓励购买库存商品房、帮助农村居民在城市买房等等。这意味着一段时期内，通过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将成为内地稳增长的优先议题和重头戏。

香港《文汇报》22日报道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及去库存及去产能。对此，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表示，高端房地产可以考虑彻底放开限购。而解决农村宅基地变现问题、以半租半售方式盘活租赁市场等手段都有助于房地产去库存。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哪些信号？

风控是核心、创新是生命，两者平衡共进金融才能平稳发展。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被再次强调。记者梳理发现，相比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被着重强调。

#### 金融服务为谁创新、如何创新？

2015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出现波动，银行业不良持续双升，投资理财市场问题不断，无不提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潜在的金融风险。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处置信用违约、遏制非法集资、化解地方债务、加强全方位监管等社会关切问题，逐一提出明确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矛盾多是金融创新与风控出现脱节所引发。

金融创新是由市场需求孕育，而非监管带来的。但无规矩不成方圆，创新也要遵守法律、道德和职业操守底线。金融为谁创新、如何创新、怎样把握风控，亟待梳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最盈利的银行并不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初衷。”近期，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环球时报》举办的“金融创新变革与机遇尖峰对话”上表示，前些年为扶持银行业发展、剥离不良资产，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在银行人共同努力下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龙永图认为，银行作为市场主体，赚钱盈利本无可厚非，但作为金融业服务机构，如果所服务的对象盈利水平走低、发展受困，对银行机构考核、发展的标准是否需要调整，值得商榷。

“金融创新服务对象是实体经济，要在扶持小微、三农等领域发力，寻找供给端新需求和市场服务痛点，避免金融产品钱炒钱、泡沫化现象。”他说。

在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看来，金融机构下沉是未来创新改革的重点之一。他说，金融服务不缺锦上添花，缺少雪中送炭。要在县域、乡镇、行政村设立门当户对的小金融机构，服务匹配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在金融支付、小额信贷等领域寻找县域金融供给新需求，从机构、产品、资金、人才，大数据上发力。

“不设立金融机构仅在服务上覆盖那是理想状态，没有机构下沉服务很难实现。”他还表示，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除了现有的主板、中小板、区域股权市场外，农村权证交易市场也有较大创新发展空间。

### **坚持金融风险底线思维**

创新与风控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如何寻找平衡点，考验金融发展的智慧。

11月2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原来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未来五年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应警惕四方面问题，首先是民间非法集资，应及时掌握对地区金融安全造成的影响；其次是制造业企业高负债，产能严重过剩，还本付息压力大；第三是房地产项目烂尾，可能导致的系列问题；第四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的外债压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信用违约、地方债务、非法集资、监测预警等，给予更多重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会议提到调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创造利率正常化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两者看似独立，实则有内在联系。

鲁政委认为，我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墨守“刚兑”传统，导致不同主体间融资成本无法按照信用风险定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意味着未来将打破刚性兑付，这是深化利率市场化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助企业优胜劣汰。

“刚兑传统容易诱发混淆视听的非法集资现象，以庞氏骗局方式与金融机构争夺资金，导致金融机构负债成本居高不下，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造成困难。”他说。

北京一家P2P网贷平台高管对记者坦言，网贷行业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融资难”现象，但远未触及“融资贵”问题。当下平台给投资者的收益集中在8-12%，再加上平台信息中介费用，企业融资项目成本并不低，但实体经济利润在此区间的行业、企业很少。“利率水平高居不下，也是P2P网贷行业多未达到盈利的重要原因。”她说。

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安全报告（2015）》也指出，经济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金融隐患，此外还应警惕房地产、人口周期及地方政府债务周期发生共振，诱发风险。

## ◆学习参考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有哪些重磅信号值得关注？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引领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准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并为2016年的经济工作定调，关系国民经济走向和民生福祉，同时，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关键之年，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望释放一系列重要信号。

2015年，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喜忧参半：一方面，新的经济动能不断涌现、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稳定提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通缩趋势明显、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作出怎样的部署，哪些热点议题又将引领新一年的经济工作？

#### **对内：平衡供需两端 供给侧改革或成政策重点**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中央对“供给侧改革”的重视释放出决策层“从生产供给端入手，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信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在接受人民财经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总量的不断扩大，供给的问题日益突出。但这深刻反映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位，制约供给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改革。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近日表示，“我理解供给侧改革，就是让要素再流动起来，让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高效领域，从已经过剩领域转移到更有需求的领域。”王一鸣建议，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过剩产能的退出机制，特别是要能够有效地解决那些僵尸企业。

当然，供给侧改革的推行并不意味着需求端改革的停滞，要“两头促进”，不能“一头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需求方面政策的调整见效快，供给方面的调整见效慢，所以一定要注意双方的互动，有什么办法能够互动加强？他从两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不能用过去“大水排灌”的方式，应该用定向调控的方式；另外，为了使长期、中长期结构调整能够到位，必须要培养人才。

#### **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经济的蓝图》的署名文章。其中，文章开篇就明确提出：2016年，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

李克强总理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

事实上，“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正在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拓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抓手。在10月访英时，习近平主席就曾指出，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匡贤明对人民财经表示，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开好局的关键在于一些关键的改革要落地、要破题，使传统发展动力尽快向新动力转变，而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及对外开放，将是统领对外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金融、房地产或成重点**

中央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进行说明时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11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提到，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具体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匡贤明同样认为，监管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将会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望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方向。

业界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同样将对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成为主题，中央就房地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据认为，这些内容将有可能被吸纳进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成为2016年的工作重点。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也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会议还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由此可见，做好城市工作特别是进一步推动城镇化也将成为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

匡贤明认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还在于为中长期发展奠定好的开局。从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需求看，除了房地产、金融外，2016年工作的重点可能还有：第一，基础设施与社会投资，尤其是服务业投资缺口还比较大；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文件后，2016年将是落实的关键一年；第三，财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需要在2016年取得重大进展。

## 从关键表述看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作为我国一年一度级别最高的经济专项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2015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阐述了 2016 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 2016 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细读本次会议内容，不难发现其中亮点颇多。人民网财经为您一一梳理。

### 【高频词】

#### 新常态

会议内容 8 次出现“新常态”，其中重点提到——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创新

会议内容 14 次出现“创新”，其中重点提出——

“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

#### 改革

会议内容 47 次出现“改革”，其中，重点提到——

“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指出，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新表述】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原文]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原文]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 五大政策支柱

[原文]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 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原文]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 一图看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如何部署2016年 经济工作

编者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总基调**  
稳中求进

## 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

### ● 推动经济发展

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 ● 稳定经济增长

要更加注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 ● 实施宏观调控

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 ● 调整产业结构

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

### ● 推进城镇化

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

### ● 促进区域发展

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

### ● 保护生态环境

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  
方式和消费方式

### ● 保障改善民生

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  
难的精准帮扶

### ● 进行资源配置

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 ● 扩大对外开放

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 提出10个 “更加注重”

##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明年是攻坚之年 ★★★



**是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是适应**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01

**宏观政策要稳**

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02

**产业政策要准**

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03

**微观政策要活**

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

04

**改革政策要实**

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05

**社会政策要托底**

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

# 五大任务



## ◆媒体聚焦

### 2016 年这十大政策将影响你我生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 2016 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以下 10 项具体措施将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 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 ——买房花销可能变小

会议提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国家统计局 12 月 1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 33 个和 40 个，分别比上月增加 6 个和 2 个。

#### 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 ——购房限制可能变少

会议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表述引发高度关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限制性措施”，公众感受最为直观的就是购房、贷款等方面限制的取消或放宽。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外，多数地区已取消限购政策。年初，住建部要求各地进一步降低公积金贷款门槛，增加贷款额度，简化手续，各地均积极响应。除了限购、贷款等方面措施外，还有哪些“限制性措施”会被取消，令人关注。

### **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 **——外地人也将可住公租房**

会议提出，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 **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

##### **——农民工可在就业地落户**

会议明确，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 2015 年 11 月初时就表示，全国已经有 25 个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国家要求到年底每个省(区、市)都必须出台方案。

### **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 **——社保负担将会减轻**

会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2015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 3% 统一降至 2%，从 10 月 1 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 1% 降至 0.75%，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 1% 降到不超过 0.5%。

### **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养老金或实行全国统筹**

会议提出，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记者注意到，2015 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按照《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开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而对于统筹层次的问题，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 11 月 20 日在回应部分地区养老金发放问题时表示，要提高统筹层次，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按照社会保险大数法则，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分散风险，增强基金的共济能力。

### **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看病难看病贵有望缓解**

会议提出，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望缩小**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 **——企业员工也会受益**

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

具体措施包括：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 **——股民合法权益将受到更多保护**

会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歼灭战”集结号**

一如外界预期，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置于空前重要的地位，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这标志着，一场针对以过剩产能为代表的阻碍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役业已打响，对于未来一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为“十二五”收官前夕的一次重头会议，2015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备受瞩目。国际层面，不甚明朗的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因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严重分化而更显扑朔迷离。国内层面，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使各界对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动能尤为关注。

舆论注意到，在分析当前困难和挑战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点名“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在随后部署的2016年五大任务中，“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亦居首位。这一论述，在近年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尚属首次。有理由相信，化解过剩产能，将成为“歼灭战”的重要一役。

作为上述部署的重要背景，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痼疾。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挤占了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和更多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未来一段时期，能否成功“歼灭”更多的“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成为关乎经济结构调整成败的关键点。

同样身处“歼灭战”靶心的，还有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库存。这一任务，也被列入五大任务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事实上，对于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等的“歼灭战”，是决策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具体行业领域中的部署。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后，迅速成为各界热议的对象，也被认为代表了中央调结构思路的重大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这一表述，成为本次会议当仁不让的一大亮点。会议开列的 2016 年经济工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昭示着对于供给侧改革的侧重，将贯穿 2016 年经济工作的始终。

毋庸置疑，改革总会伴有成本，供给侧改革亦不例外。如，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部分企业出现的失业人员如何安置？个别企业破产可能引发的风险如何管控？……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关乎经济社会的稳定，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有鉴于此，经济工作会议在化解产能过剩时，特别明确了“积极稳妥”的步调，着重强调了“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与此同时，会议对“守住民生底线”予以特别强调，同时指出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面对已然吹响的“歼灭战”号角，会议提出，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同时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这一“集结号”和“总动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头戏”。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稳增长调结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京举行。据专家预计，2016 年政府经济工作或在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的思路指引下，在坚持多目标平衡的基础上，继续突出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方向，在确保 2016 年不跌破底线的时候，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实现“十三五”经济增长不低于 6.5%的预期目标。

多方机构预测，2016 年我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仍会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 16 日发布 2016 年《经济蓝皮书》，预测 201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7%左右，2016 年放缓至 6.6%到 6.8%，但是在新常态下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不会出现硬着陆。之所以对 2016 年增长形势做出这一预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介绍，主要考虑到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在加快，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仍将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已经很大，投资增速将回归常态；消费总体仍将保持平稳。

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所属的研究机构也都认为 2016 年 GDP 增速会低于去年。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虽告别“7”时代，但稳中有进，不乏亮点，预计全年增长 6.9%。2016 年，我国经济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逐步企稳。

### 预计全年 GDP 增长 6.7%。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宏观调控从供需两侧共同发力，兼顾当前与长远。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要“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调结构和稳增长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如何提及，但是从近期国家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几乎可以确定，部署 2016 年经济工作将会涉及这些内容。考虑到一些供给侧管理同样可以用于短期调控，与之相关的政策大概率将出现在 2016 年的工具箱中。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2016 年经济工作做出了要求。从目前来看，进一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企业税费都将是 2016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认为，作为“供给侧”管理的重要内容，2016 年我国将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以促进新兴产业的涌现和扩大消费新需求。包括落实已出台的针对“三农”、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服务业、新兴产业以及“双创”等的税收扶持力度；加快研究制定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切实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调节税收相当于调节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影响到对生产者的激励；通过科技进步引入新的原材料或能源，或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资源，可以降低相关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要素成本；通过资源税或其他形式的税收，可以调节相关资源的使用成本，这些都可以对短期总供给产生影响。其次，许多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的事情，对短期宏观调控没有用。实际上，对于一些特定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可以很快。比如技术上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迅速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因而在短期内可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再次，新产品的出现可以给经济创造新的供给，同时创造新的需求，因此它同时是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新产品刚进入市场时，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往往很大，因此需求很大，相应的供给也就是有效供给。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同样必不可少，稳投资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李雪松认为，2016 年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十分必要。当前应把“稳增长、增效益”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的直接作用；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先导作用和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快构建新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度扩大地方财政税源；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认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四大领域“歼灭战”

肖玮 南淄博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今日在北京召开，备受瞩目的 2016 年经济工作部署也将随之浮出水面。而在此之前，无论是 11 月中旬中财办副主任的表态，还是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多项建议，各方几乎对打好优化产能、企业减负、房地产去库存及防范金融风险四大领域的“歼灭战”形成了统一口径，多位业内专家也表示，2016 年经济工作的展开基本绕不开上述四大领域。

本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传统的 5 个“统筹兼顾”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变成了 4 个，被“排除”在外的“促改革”因为国家正在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而被单拎出来重点强调。一切的信号都在表明供给侧改革将成为 2016 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作为供给侧改革即将面临的“硬仗”之一，如何化解国内现存的大量过剩产能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上周三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也将目光锁定在化解产能上。有分析认为，在连年扩张需求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中央终于决定将改革重心从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可能对化解产能进行更细致准确的描述和定性。

房地产长期以来积存的库存则被业内看做是2016年经济工作需要攻克的第二个难点。实际上，自去年楼市进入调整期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连下跌，相对应的则是库存的一再走高。化解房地产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已是时不我待。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此前也曾表示，化解房地产库存不仅仅是为了当前的经济增长，更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去库存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杨伟民说。

实际上，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房地产库存臃肿，相关行业背后的企业经营同样也是步履维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解释供给侧改革时也明确表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对企业来说，中央政治局为企业减负定制的一套“组合拳”可谓诚意十足。在业内看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社保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等措施几乎包含了企业经营的全要素，是解决当前实体经济盈收困局的切实行动。

杨伟民也表示，如果能把化解产能和企业减负这两个歼灭战打好，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无论是此前跌宕起伏的股票市场，还是近期频频事发的金融机构，在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处处潜在的金融风险始终是一块隐忧。尽管国家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法规，但由于金融行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虚拟化、涉众性、大数据等特点，给风险防范带来了很大难度。

在业内看来，防范金融风险不仅会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更将成为2016年金融系统改革和政策布局的方向。从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首提股市的表态中也不难看出，中央对于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有分析认为，建立各种匹配的金融机制将是2016年金融改革的重点，包括审查、处罚、沟通方面的机制都在考虑范围内。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宽财政稳货币

倪铭娅 彭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如何为2016年经济工作定调是本次会议的重点。业内人士认为，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和转型期的关键之年，预计经济工作总基调可能仍是“稳中求进”。政策以稳为主，为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需要，宏观调控继续采取“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的组合概率较大。

**总基调稳中求进**

业内人士表示，鉴于经济进入结构转换期是“十三五”期间最大的特征，预计2016年宏观政策在以稳为主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2016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在世界经济见底之前，中国经济还存在下行空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旗帜鲜明地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加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经济波动的核心。应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建议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元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未来宽松政策将显著加码，特别是在提高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方面，既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支持项目推进，也需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鉴于中央稳增长背后的大逻辑是保就业，预计政府会密切关注就业形势的发展方向，相机抉择调整稳增长政策的力度。短期内，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和失业率上升，“三驾马车”的需求端管理依然不可放松。在政策层面，依然要维持货币和财政的“双宽”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拉动以基建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时配合减税等手段刺激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 关注供给侧改革

业内人士表示，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看点。过去一个月，“供给侧改革”被高层数次公开强调。

推进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政策的退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供给和需求应该是相互配合的，供给侧改革能创造需求，需求侧的减税等政策也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环境。

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应当把供给管理放在长期的视野中，并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更长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贾康看来，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已刻不容缓。供给侧改革离不开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综合配套改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协同推进供给侧改革：一是结合式，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二是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三是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四是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五是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

## ◆原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摘选）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7]，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多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8]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

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9]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10]，（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11]，（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余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蹙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

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12]、铁路罢工[13]、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14]、沙面罢工[15]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16]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地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为《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6]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〇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这里是指中农。

[8]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9]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0]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11]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2]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于一月十二日，坚持了八个星期。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上海海员罢工于八月五日开始，坚持了三个星期，也得到胜利。

[13]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二月七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14]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当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矿工三万余人举行的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对这次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焦作煤矿，在河南省北部，当时也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焦作罢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响应五卅运动而发动的，前后坚持七个多月。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并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项条件。

[15]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16]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六月十九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7]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来源：人民网

##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 二 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

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他的政策的不错误。

###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

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注释：

[1]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11]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来源：人民网

##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2]。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and 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

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3]、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4]、李闯[5]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 (一) 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 (二) 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 (三) 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 (四) 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 (一) 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 (二) 从制度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注释：

[1]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2]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黄巢（？—一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〇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5]李闯即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来源：人民网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

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不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2]、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3]，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4]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5]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6]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7]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8]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

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日，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9]，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如到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0]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11]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大城市中’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

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2]，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3]，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4]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15]旅已被击破；陈卢[16]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17]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

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18]、熊式辉[19]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出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来源：人民网